

《辽海志略》奉天抄本述略

丛佩远 柴 营

《辽海志略》，清隋汝龄编辑，全书一百六十卷（一作六十四卷），约三百余万字，系私修东北方志中仅见之巨著。原书成于清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，百余年来未有刻本，仅以抄本流传。目前所见抄本有三，一为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残卷五册（下称南开抄本），一为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残卷四册（下称辽图抄本），一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所藏之残本六十册（原为奉天通志馆所抄，下称奉天抄本）。南开、辽图两抄本残缺过甚，几无法利用。奉天抄本较原稿仅缺四册，尚称完备，然以珍稀之故，鲜为外间所见。

有关《辽海志略》原稿及奉天抄本之只鳞片爪记载，仅见于金毓黻之《静晤室日记》（手稿，藏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）。近人方志目录于《辽海志略》虽有著录，均寥寥数语，多系辗转相抄，颇有讹误。本文拟就奉天抄本及《静晤室日记》中之有关记述，对《辽海志略》一书略加介绍，以供有关研究者参考。

隋书原稿之流传

隋汝龄，字九芑，祖籍山左宁海（今山东省牟平），清康熙年间，其先人自山左迁于辽左金县（今辽宁省金县）隋家屯，至隋汝龄“盖五世矣”。隋汝龄生卒年不详，仅知其于道光五年（1825）取中拔贡，就任赣榆（今江苏省赣榆）县令，后官至江宁府督粮同知。迄同治二年（1862年）隋犹在世，估计其后不久即逝去，故隋汝龄当为清嘉庆中叶至同治年间人。或谓其为“清

咸、同间人”，①是不够确切的。关于隋汝龄的官职，各书均载作“历官祝其、赣榆等县知县”。②按祝其、赣榆两县皆始置于汉代，两地毗邻，于唐代合并为赣榆，此一建制迄清末变，故不得谓清季犹有赣榆、祝其两县并存，更不得谓隋汝龄曾相继为赣榆、祝其两县之令。

隋汝龄自幼“生长辽左”，为官江南后，“睽念桑梓”之情时萦于怀，深感前代于东北地区之历史，或者“未兴载籍”，或者“规制未备”，或者“散见于史册及诸家所记”。遂欲以《辽海编》、《辽东志》、《盛京通志》诸书为范本，“泛滥推广，私为一书，以继其后。”③于是自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起，隋汝龄以一人之力“掌握手书”，孜孜不息，“搜辑考订历二十年而成”三百余万言之煌煌巨著。

据隋汝龄自序，《辽海志略》初稿成于“咸丰二年冬十二月上浣”。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四月，漕运总督吴棠为出版《辽海志略》所写推荐信中说：《辽海志略》一书“例虽等乎别录，功实迈于土诵，敢矢一辞，俾附巨帙，请付梨枣，以待轩轺”。④可见直至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《辽海志略》犹未付刻。

1957年出版之《中国边疆图籍录》于《辽海志略》录作：辽海志 一百六十卷（清）随汝霖撰 钞本（北平东方文化委员会图书馆藏）六十四册；清咸丰二年（1852）刻本（题：辽海志略六十四卷随汝霖撰）。

按此著录之误有三：

其一，姓名之误，“隋”误为“随”，“龄”误为“霖”；

其二，书名之误，《辽海志》下夺一“略”字，东方文化委员会图书馆抄本（下称“东方抄本”）金毓黻曾见，亦作《辽海志略》；

其三，谓有“咸丰二年刻本”，实误。咸丰二年为《辽海志略》成书之年，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犹待“请付梨枣”，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绝无刻本可言。一直关心《辽海志略》整理与出版

之金毓黻，至1960年犹云《辽海志略》“迄未付印”。⑥

1958年版之《中国地方志综录》，据金毓黻《辽海书征》著录作：《辽海志略》，一百六十卷，隋汝龄撰，咸丰二年稿本，钞本。1986年出版之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著录更为简略：辽海志略一百六十卷，清隋汝龄纂修，清咸丰二年修，抄本，南开。所增录者为南开抄本，于原稿及其他抄本一无所及。

《辽海志略》原稿在隋汝龄“歿世后，此稿流落北平书肆，为大连满铁图书馆购获”，时间约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。1948年1月，金毓黻于《静晤室日记》谈及《辽海志略》一书时说：

“原本藏大连满铁图书馆，分订六十四册。前二十年，袁洁珊、白佩珩两先生主修《奉天通志》，乃向大连图书馆借钞一帙”。是奉天抄本系1927年始修《奉天通志》之际，借大连图书馆原稿抄录而成，并依原稿分订六十四册。《奉天通志》于卷226艺文四、卷227艺文五两次著录《辽海志略》，第一次正式披露了该书的存在，并于卷227、232、244转录了该书的自序、梁佐中序、吴棠序。1942年金毓黻将其所著《奉天通志》艺文一至六“书征”部分单独出版，题名《辽海书征》，《中国地方志综录》即据此书著录。

《辽海志略》原稿藏于大连图书馆，但自1927年《奉天通志》馆借钞之后，即去向不明。1947年金毓黻谓“今大连图书馆藏书（指《辽海志略》原稿）已不卜其存亡”，拟再度借抄而未果⑥。可以说自1927年借出之后，即无人言及再见《辽海志略》之原稿。笔者亦几次询问《辽海志略》原稿状况，该馆均云已无是稿。以二十年之心血，独立完成之一代重要地方文献，百余年未能付印，原稿竟亦遗失，至为憾事。然奉天抄本犹存六十册，虽非全豹，所缺有限，尚称幸事。

奉天抄本之流传

如前所述,《辽海志略》现有三种抄本。其中南开抄本五册,1985年承来新夏先生手示该抄本所存册数、卷数及目录,经与奉天抄本核对,编排虽略异,但皆不出奉天抄本所有。辽图抄本四册编排与原书大异,但内容亦不出现存之奉天抄本。是以欲图补齐《辽海志略》原书,唯有待来日访得原稿或他种抄本。

上述三种抄本之外,尚有邓衍林《中国边疆图籍录》著录之东方抄本,此当为所知各种抄本中时代最早的一个抄本,抄写时间当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前,原稿尚在北平时。

东方抄本,1948年秋金毓黻尝见之,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秋间在北平东方学会存书处发现该书(指《辽海志略》),亦传钞一帙,居然完好”。⑦八十年代初,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,为求补齐奉天抄本之残缺卷册,曾往北京访求东方抄本,闻东方文化委员会图书转归首都图书馆,及至该馆查询,答云并无此书。是东方抄本亦已散佚,时间当在1948年金毓黻发见该书抄本至北平解放前。

奉天抄本有人称之为金毓黻抄本⑧,这是不确切的,因为它并非金毓黻所抄。1927年,《奉天通志》馆据大连图书馆《辽海志略》原稿“借钞一帙,迨《通志》修竣,乃以钞本移送洁珊(袁金铠)先生家中”。是奉天抄本自1934年起为袁金铠所有。参加编纂《奉天通志》的同时,金毓黻曾拟将《辽海志略》收入《辽海丛书》,后“以卷帙繁重未能也”。1936年金毓黻离开东北,“南窜十余年,时时念及此书”。⑨1947年4月5日,金毓黻自南京重返沈阳,4月15日回故里辽阳一行,当日即至袁金铠家借《辽海志略》奉天抄本。金毓黻在日记中记道:“先生(袁金铠)钞存《辽海志略》六十余册,余欲收入辽海丛书,付之铅印,属袁公子(袁庆泽)检出”。此次金毓黻取走《辽海志略》奉天抄本五

十九册，尚缺第8、16、35、39、48五册^⑩。

5月13日，袁宅大火，“将存书焚失过半”。5月15日金毓黻致函袁庆泽，嘱其留意奉天抄本所缺五册是否有火中余生者。

5月19日，袁庆泽自辽阳赴沈，至金毓黻处，“持来《辽海志略》一册（第8册），盖掇拾于灰烬之余，不啻中郎之焦尾琴，即所缺五册之一也，其他四册度为祝融氏收去”。^⑪这就是今天奉天抄本仅为六十册、尚缺四册的由来。

1947年秋，金毓黻在北平东方文化委员会发现了东方抄本，“居然完好，可以借钞，以补余所得本之缺，为之喜出望外”。但因忙于编写民国史之工作及战事日紧而搁置下来，只好寄希望于来日，“倘时局澄清，将此书付之剞劂，则余之宿愿酬矣。”（《日记》）

1959年11月，金毓黻病重之际，预立遗嘱，将《静晤室日记》及校订书籍七种捐赠中国科学院原历史三所。1962年8月，金毓黻病逝，其藏书转售于东北文史研究所，捐赠历史三所之日记、书稿等也经商定由历史三所转交东北文史研究所保存、整理。这样，至1965年，《辽海志略》奉天抄本六十册转归东北文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。东北文史研究所等单位重建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后，《辽海志略》奉天抄本列为该院图书馆特种藏书。

奉天抄本内容简介

《辽海志略》奉天抄本系用无格白纸毛笔楷书抄录，书稿高约27厘米，宽约17厘米，牛皮纸护封，线装书装。除书首吴、梁二序每半叶6行、行20字外，余均半叶10行，行20字。

第一册首叶有朱文印三方，一为1947年以后加印之“辽阳金毓黻收藏图书金石书画之印”，一为1965年以后加盖之“东北文史研究所藏书”印，一为1973年加盖之“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藏书之印”。其余各册亦均加印有上述三印中之一方或两

方。

奉天抄本系集多人分头按原稿抄录，当最接近原稿面貌。细审奉天抄本，可以看出原稿系未定稿，有许多尚待加工之处，这也可能是该书始终未能付刻的原因之一。

首先，《辽海志略》内容分类，隋汝龄自序谓“为类二十四”。但是据奉天抄本总目录所载，即使把图例除外，尚有二十五类，即天文、地舆、城池、关隘、宫殿坛庙、山川、古迹、建置沿革、风俗、官秩、封爵、编年纪事、帝纪、割据、属国外藩、选举、仕宦、名宦、人物、流寓、方外、烈女、考据、杂记、艺文。同时目录之分类与正文所载之分类又略有不同，如目录“官秩”类正文作“秩名”，目录中之“流寓”、“方外”二类于正文并入“人物”类，目录中无“补遗”，而封面与正文皆有“补遗”一册……。总之，序、目录、正文之分类颇不统一，此为书稿未最后敲定证据之一。

其次，关于全书分卷，《奉天通志》、《辽海书征》、《中国地方志综录》、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诸书著录皆作160卷，此系依据该书序言及总目所载。《中国边疆图籍录》在160卷本外又著录一64卷本。仔细研究奉天抄本的情况，两种分卷的痕迹均尚存在。各册封面大体是按64卷划分，即每册为一卷，但也有出入，即第3册封面未标卷而实际占有3、4两卷；第47与49册中间缺第48册，而47与49册却分别占有第48、49卷，中间卷数不缺。又封面64卷之分仅标至第57卷，58卷以后未标。160卷之划分，在1——7册中与64卷划分法并存，即封面按64卷划分，正文前按160卷划分。自第8册开始，仅存在封面之64卷划分法，而正文不再标明160卷之具体卷数。虽未标明，有些册仍可看出按160卷划分之段落起止，但大部分则已痕迹不清，无法比照总目录160卷再行划出各卷之起止。上述情况表明，最初编辑构想似拟分为160卷，但实际编辑过程中分不出160卷，且嫌过于琐细，

因此隋汝龄改变计划，大体按册分卷，这就是64卷的由来。凡此种种，皆说明该书尚未细加审订最后定稿。

最后，在内容上也存在着不少尚待加工之处，进一步说明《辽海志略》是一部未定稿。以山川志为例，正文中按160卷序列划为第14——16三卷，但各卷内容编排略显混乱，如第14卷全部为山，第15卷大体均为水，第16卷则山、峪、河、井、谷、潭、华表、台、楼、洞、岛、泊均有，相当凌乱，实则大部应分别编入14、15两卷，部分则应入于其他类中。解释体例也风格不一，14、15两卷于各山、水解释尚较详细，文字也较严谨，第16卷各条下则三言五语，草草了事，且与前两卷有重复之处。如14卷卷末有兴安岭条，16卷卷末又出现兴安岭条，且记叙有歧异，是第16卷显系较晚抄补，尚未进行加工整理。

总之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《辽海志略》是一部未定稿。尽管如此，此书在研究东北史地上仍具有很大学术价值，金毓黻先生对之极为推崇，他认为《辽东志》、《全辽志》、《盛京通志》为研究东北古史之重要文献，“《辽载》及《辽海志略》，更为补《盛京通志》之未备而作。居今而欲考东北史，断难束此诸书而不观，故吾断言曰：前代之东北史，不出上列之地方志”。②

《辽海志略》一书的编辑特点，归纳起来，大致有如下两点：

其一，在内容编排上，《辽海志略》基本采取了一般志书体例，但略有不同，它吸收了纪传体史书的某些编排方法，增加了割据、属国外藩、帝纪等类别，使本书具有地方通史的性质；同时又没有一般志书的食货、赋税、物产诸志，因为隋汝龄认为“食货、赋税、物产诸门皆作志要事，然前志（指《盛京通志》等书）已详，复载转嫌繁冗”。

其二，隋汝龄自述：“《志略》所引事实，专主搜罗遗迹，故广收博采，其间过于烦冗之失亦所不免”。是本书资料搜辑比较完备，比较丰富，人物志“多采史传，旁及杂记，凡有政绩于

辽海者俱考核详备”；名宦志“搜罗史传通志诸书，凡有仕于辽海者，虽微序小官必详载之”；杂记“以正史记传所不能尽详者，间取杂志野史中所载事实，以补正史之所不及”；关于艺文，“前志所载诗文亦甚寥寥，兹探索遗编，采择旧籍，由汉魏以及元明高文典册，凡有关涉于辽海者必详载之”。

隋汝龄所依据的资料虽大多出自正史、志书，但事无巨细，咸在网罗之列，因而比较全备，提供了许多可供参考追寻的线索，同时也辑录了一些较少为人所知见的篇章和史实。同时不能不指出，隋汝龄的主要贡献在于对资料的搜罗、爬梳、整理，而于考究辨析则功力较浅，且不无武断失实之处。

《辽海志略》一书虽然瑕瑜互见，但在有关东北地区的方志中仍属佼佼者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，除其前之《盛京通志》，其后之《吉林通志》、《黑龙江志稿》、《奉天通志》而外，其余诸志无出其右者，可以说《辽海志略》与上述四志为有关东北之五大志书。

自三十年代迄六十年代，金毓黻先生几度欲将《辽海志略》付印，以广流传。前期，他想将《辽海志略》全帙付印，建国后他先是提出《辽海志略》“其书移录自《盛京通志》者不必再印，取前志所未具者，细为先录，约为二十卷”，^⑬继而又提出：“《辽海志略》人物、艺文多录自《盛京通志》，为避免重复，可以删节为十册，成为《辽海丛书》之第十一集。”^⑭金先生的删订整理计划虽不得其详，但从奉天抄本金先生所做眉批及改订手迹可以看出有这样几个方面：统一卷序；整齐体例；确定分段、标点格式；校核引文；订补史实；订正错、漏、倒字以及异体字。可惜，金先生未能最后完成这一工作。隋汝龄以二十年之心力辛勤编辑而未能付梓，金毓黻筹措三十余年亦未能出版，《辽海志略》之遭遇至为坎坷。然奉天抄本硕果尚存，有朝一日或可付印面世也！

注:

①⑥金毓黻:《静晤室日记》(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藏手稿)卷139,民国36年5月13日。

②《奉天通志》卷226、《辽海书征》卷4、《辽宁地方志考录》第24页。

③《辽海志略》隋汝龄自序。

④《辽海志略》吴棠序。

⑤⑬《静晤室日记》卷166,1960年1月17日。

⑦⑨⑩《静晤室日记》卷144,民国37年1月11日。

⑧《辽宁地方志考录》第24页。

⑪《静晤室日记》卷140,民国36年5月21日。

⑫《东北通史》,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0年版第14页。

⑭甘孺:《辽海丛书》,见《史学集刊》1982年第2期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

《中国历史文献学》出版

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,在文献工作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。广西师大等七所高等院校的部分教师,根据教学与研究的体会,并吸取近年来有关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的新成果,合作编写了《中国历史文献学》一书,已于1989年6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本书由张家璠、黄宝权主编。全书分十章,简明、全面而又系统地阐述了有关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对象与任务,历史文献的产生与聚散,以及历史文献的分类、目录、版本、校勘、考证、辨伪、辑佚、标点、注译、典藏、阅读与检索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与知识,并用专章对中国历史文献的研究工作加以历史的回顾与展望。坚持思想性、学术性、实用性、可读性的统一。内容充实,行文流畅,对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颇有裨益。

· 方 平 ·